呼和浩特市:拓展“两个覆盖”有实招

《内蒙古日报》消息 近日，庄严肃穆的会场内党徽闪烁，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呼和浩特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委员会在全区范围内率先成立，随即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呼和浩特市非公经济组织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这是呼和浩特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又一新动作和新尝试。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要建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们把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两个覆盖’作为非公党建的前提基础，精准研判、综合施策。”呼和浩特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张晓明说。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谋划，把贡献了80%以上就业岗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凝聚在党的旗帜下，成为打造更具活力、更为美丽、更加和谐首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非公党建要开展得好，首先是要建立一个能抓得住、管得好的组织领导机构，从根本上破解体制性问题。经过充分调研，2016年9月，呼和浩特市委便成立了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工委，出台《呼和浩特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工委工作规则》，在市委组织部、工商联、工商局、民政局分别设立党工委办公室、非公企业党建办公室、个私经济组织党建办公室、社会组织党建办公室，并建立由统战、工商联、民政、工商等22个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9个旗县区参照市里的做法成立相应非公党建组织领导和工作机构，各开发区、工业园区均成立了企业党委或综合党委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99名。通过理顺机制，形成了市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党工委具体负责、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权责明晰、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为全市非公党建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

随后，该市制定《关于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两个覆盖”专项集中推进的方案》，签订责任状，按照“人要到户、情况摸准、不留死角”的要求，抽调2300多名工作人员，成立886个调查组，严格按照法人单位和实体化运营两个条件，对全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进行“地毯式”排查，对其总量、发展情况、业主身份、党组织设置和党员情况做到“五个清楚”。

按照“有利于党组织成长发展、党员教育管理、党的工作有效开展”原则，根据行业特点、规模大小、地域分布，采取单独组建、挂靠组建、行业联建、“1+N”龙头带建等灵活方式，做到党组织应建尽建。对没有党员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选派党建工作“双指导员”。按照“一对一、一对多”原则，从街道选派属地指导员，从行业管理角度选派行业指导员。推行“责任制+清单制+项目制+督导制”，2094名党建指导员带着工作规程、操作手册上门手把手指导党建工作。

此外，32名市级党员领导干部、212名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建立了438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联系点，指导开展党的工作，帮助解决发展难题。同时，按照“党建带群建、党群共建促发展”的思路，通过“工建铺路、团建搭桥、妇建跟进、党建通车”模式，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建立群团组织765个，形成党工青妇相互支撑、同步推进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按照“一企一策一特色一品牌”的思路，选择非公党建工作基础好、企业主支持的非公企业党组织，成功推选自治区级党建示范点3个，同时积极打造市级非公党建示范点16个，创建“双强六好”非公企业党组织139个，“六个好”社会组织党组织54个，较好地发挥了品牌示范带动效应和典型标杆作用。还投入700多万元，建设园区综合性党群服务中心10个；依托街道社区，建立了5个社会组织党群活动服务中心，辐射服务1077个非公企业和150个社会组织。

目前，全市5221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已有2141家建立党组织，覆盖率41%；1327家社会组织中已有603家建立党组织，覆盖率45.44%；党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工作覆盖率达到100%。

（郑学良）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深入调研 为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调整结构，依靠自主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品牌价值。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够上新路。”

“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不能再只是从前那样单纯引进来机器设备了，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这些都涉及企业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调整结构，依靠自主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品牌价值。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和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够上新路。”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

88岁的厉以宁仍然每年坚持到基层调研，始终关注民营企业发展、产权改革等，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经济学界泰斗”“股份制改革第一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厉以宁是中国经济改革制度设计的建言人和参与者。1986年，厉以宁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当时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不畏压力，继续积极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他还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为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和国有企业改革做出重要贡献。

厉以宁一直关注非公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提出应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厉以宁就是这份文件的最初倡议者和主要推动者。随后“非公经济新36条”出台，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农村发展问题始终萦绕在厉以宁的心头。“当前我们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密切相关。”厉以宁说，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确权问题，只有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农民才能安心。而尊重土地的经营权，保护经营者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农民的承包权稳下来，经营权活起来。（据《人民日报》）

改革先锋风采

身先士卒抗日寇——邓永耀

在湖南省湘东山区的茶陵县，虽然抗日战争已结束70余年，但英烈邓永耀依然被当地人民深切缅怀。

邓永耀，又名邓永辉，1912年1月出生于茶陵县腰陂镇大冲村（今腰潞镇珍武村）。家庭生活贫苦，后父母因病去世，他很小就成为孤儿。

1927年“马日事变”后，邓永耀在共产党员邓有禹的启迪下，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共青团茶陵县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秘书长。后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总务处长。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军团政治部文书、总务处处长、军团宣传队队长、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

1934年8月，邓永耀随红六军团西征。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他随萧克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任师政治部主任。在长征中，邓永耀注重在部队及群众中宣传鼓动，注重社会调查，注重扩大新兵，对敌斗争坚决勇敢。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邓永耀调任八路军第129师骑兵团政治委员，率部转战冀南一带，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在刚进入冀南的战斗中，他带领400名新兵，击退了由40多辆汽车运载的日寇，从此以骁勇善战著称。后调任冀南第5支队政治委员，率部转战于武邑、阜城、枣强一带，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扫荡”。

1939年初，邓永耀调任第129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3月3日晨，率部在武邑东南徐村与日军遭遇，他命令一部分战士掩护群众转移，一部分战士撤向邓庄村南设伏，自己带领30多名战士担负阻击任务。

在激战中，邓永耀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正准备向伏击地段转移时，不幸头部和腿部中弹昏倒在地。他在片刻的苏醒过程中，敦促战士赶快将敌人引入伏击圈，并举枪向敌人射击。最终，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27岁。

邓永耀牺牲后，《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39年4月11日刊载了《纪念邓永耀同志》一文，对他的抗日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武邑县军政民各界在他墓前立碑记述：“邓公永耀先生，江南有志之士也……领导东纵驻军来武，以身作则，英勇杀敌先后数十役……武邑群众相见最切，相感最深。”

在邓永耀家乡茶陵县，他的英勇事迹被广泛宣传。1949年后，茶陵人民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发扬战争年代拼死向前的革命精神，投入创造美好生活的建设大潮之中，将一个偏僻边远的贫困县建设成了交通便捷、产业兴旺的湘赣边界中心县，并于2018年6月实现脱贫摘帽。（据新华社报道）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